

中国社会学
经典文库

中国人 行动的逻辑

翟学伟 著

中国社会学
经典文库

中国人 行动的逻辑

翟学伟 著

Copyright © 2017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 翟学伟著. —北京：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2017.10

ISBN 978-7-80768-181-6

I. ①中… II. ①翟… III. ①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1208 号

责任编辑 苏毅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 数 253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再版自序

此文集是我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的第一本书，其中的绝大部分论文写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由美国八方企业文化公司在新加坡出版繁体字版（2000年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2001年版）。这两个年度正逢跨世纪，因此它多少表达了我做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心愿，也就是寄希望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社会学研究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今日重读此书，似乎并不感到陈旧和过时，因为书中讨论的这条道路依然在起步阶段，并且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学术界当年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争议，源于改革开放初的大背景，那时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记得当时我们在大学课程中所用的教材几乎全部是舶来品，即使不全是，起码也是对舶来品的组装。那时做点研究，能阅读的研究资料非常有限（没有互联网，连复印机都很少见），一个学者如果能设法得到一些英文资料，或者能知道一点西方理论和方法，是非常值得自豪和荣耀的事情。因为它无形中检验着一个学者的学问好还是不好。虽说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也兴起过学科本土化讨论，但最终演变成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十几年过来了，学术规范化早已不再是问题（其实这并不归功于那场讨论），不少中国学子如今能在世界最好的学刊上发表英文论文，但中国社会科学如何发展的的问题依旧。学者们还是在相关问题上犹豫不定，争论不休。可是也就在这十几年中，整个中国社会与市场

却无视学者们怎么看，正以自己的方式和轨迹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此时，那些习惯了雾里看花的学者如何回应这一变化呢？上述的种种态势其实已宿命般地导致其大量的研究只能是“经验很丰富，理论很苍白”。当中国学术界尚无法对我们的社会与市场予以回应和预测之际，世界又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智能手机、微博、微信等电子交流的时代，此时，信息资料已不再是问题；而当年的留学生大量回归，人才与国际学术接轨也不再是问题，有问题的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如何发生与发展。不知道这一点什么时间能得到正视。

显然，受上世纪学术环境的局限，此书中的理论探索已显粗浅和不足，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跟进，尤其有赖于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突破，也需要更扎实的理论推演。而更加令人焦虑的是，这一被冠为大变革、大转型、大数据以及社会急速变化之处境，让很多事物和现象的留存本身也成为学者面临的话题。我自己的一贯研究见解是，尽可能在变中看到不变的部分，至少是难变的部分，因为这部分还可以让我们从中辨认出这样的行动特征是否是中国人的，抑或，全球化已然让“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变成了一个传说。

此次借助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旗下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的新版，我拿掉了原书中的《社会心理承受力与社会价值选择》一文，加进了一篇2014年写成的《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也补充了另一篇有关价值观的文章，这样显得更贴近本书的主题一些。

翟学伟

2015年5月17日

于宝华山麓仙林翠谷

自序

本书的内容应算是对我近年来学术思考及研究的一次小结。这一小结始终是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是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框架内或结论的对立面上来做学问的，比如，我们许多研究只知道用西方的现成理论、概念、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而从不考虑它们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如是否具有契合性或脉络性，以及不同社会成员对自己的社会有没有不同的预设等。随着本土化研究在华人学术界的开展，尽管上述问题已有所改观，但比较文化上的二元对立倾向又随之暴露出来，即我们从原来的生搬硬套西方成果转向了在西方许多研究的对立面上来呈现自己的社会与文化特征，诸如西方人的价值是个人主义的，我们中国人的价值是集体主义的；西方学人的行为是普遍主义的，我们中国人的行为是特殊主义的；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及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中国代表着传统，西方代表着现代等等。看起来，这样的研究比照搬西方理论与方法或一味验证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进步，因为它既具有文化比较研究的色彩，又有了本土化研究的特点。但我仍然认为，这样的研究理路还是在培养我们的思维惰性，麻醉我们的学术神经，降低我们发现问题的敏锐度。

由此一来，本书所涉及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无论是其视角、理论、概念、方法，还是具体的社会现象等，都与上面的研究思路

有所不同。我的基本做法是先回到中国社会现实去看、听、闻，去观察、发现、体会，然后去寻求用什么来表达它们是什么。我认为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不存在本土契合性的和是否二元对立性的争论。因为契合性和二元性共有的特征都是在关心如何摆放西方学术同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一种由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研究概念、方法和框架是不以这种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它既不会关心如何使用一套西方的理论，也不会关心如何让自己的研究同西方结论相反，而是关心我们在这个社会中能有什么学术成就来反映和解释这个社会。当然，这里面可能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研究者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学术训练才可能让他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一种能被称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学科，首先就是由西方人确立的。但我认为，接受这些学科训练，并非就是接受某种范式、理论、方法等，也不是一定要去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性，而完全可能是获得一种学术眼光、学会资料处理及具有分析与解释上的能力而已；同时，阅读西方的学术经典，也不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学术洗脑，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社会和人的现象被有洞察力地叙述的张力有多大。我想，在这种立场上做出的研究就会在认识上不同于上述争论，在结论上又是由自己社会的问题意识所引导的。它不源于西方某个理论，也不必然同西方社会相对立，而在所获得的研究结论上又不同于当地的民众生活经验和当地传统思想经典，如儒家思想等。

总之，我的观点是，所谓本土化的研究就是不去套用西方现成的东西，也不投机取巧地做二元式的对比，而是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重新进行思考和分析。或者说，本土化就是让我们在研究时换一个角度，即不直接通过西方学科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发现现象和问题，而是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对应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为了统合我的这些想法和研究，我将此

书命名为“中国人行动的逻辑”，按“视角与方法”“概念研究”“经验研究”“理论与框架”等几部分，对已写过的论文做重新的加工和编排，以便能较全面地涉及我这一段时间里对本土化的目的、视角、方法、概念、模式和理论等方面的思考、议论和研究。应该说，这里的文字不但表达了我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认识和解释，也反映了我近些年来的思想历程。这里面有我遇到的困惑、焦虑、沮丧和欣喜；也有我对一些文字表述上的犹豫不定以及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正。我深感，在现有的理论范式中做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的学问，是最省心、最安全的一种方法，一旦想放弃这种选择，就会面临危机、挑战、陷阱、批评和失败。但我也相信学术的进步、学术的原创性正在于此。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社会学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社会理论学报》（香港）、《东方》、《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江海学刊》、《南京大学学报》等杂志社的编辑们曾给予我的学术空间，因为书中不少篇章最先是在这些刊物上接受学术考验的。我还要感谢南京大学的洪银兴教授和张永桃教授对我学术成长上的帮助，以及我的博士生导师蔡少卿教授对我的学术认同和支持。这里尤其要感谢的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因为受该系的阮新邦博士的鼓动和系主任麦萍施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不但萌发了出版的念头，而且还有机会就书中的学术观点同该系的教师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香港顺利完成了对此书的修改工作。我周围一些了解我的同仁以为，我的研究特点同我的人格特征有很大的关系，我想，无论这点是否成立，我都要将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父母。

翟学伟

1999年10月于香港百萃苑

目 录

再版自序	3
自序	5
第一部分 另一种视角：关于本土化、研究理路及其方法的若干思考	
本土化研究的程度与限度：我们能走多远	5
儒家的社会建构：中国社会研究视角与方法论的探讨	16
语言分析：一种不容忽视的研究方法	44
第二部分 本土概念研究与讨论	
中国人脸面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63
附：从脸面的异质性看《围城》中的知识分子	78
“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中国地方与组织领导的权力游戏	88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历史性的分类及其转型中的问题	103
附：价值缺失的年代与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119
第三部分 本土经验研究及其问题	
中国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平衡性问题：一项个案研究	133
家族主义与工具理性：苏南农村的社会调查	156

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兼论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 174

附：耻感文化的狡黠之处——从一项问卷调查想到的 197

第四部分 建立本土理论框架的尝试

中国人际关系模式 209

中国人在社会行为取向上的抉择——关于本土社会行动模式变量的
考察 228

附：从本土社会行动理论看中国人“窝里斗”吗？ 263

个人地位：从一个概念的提出到一种本土日常社会学
分析框架的建立 273

后记 299

第一部分 另一种视角：关于本土化、研究理路及其方法的若干思考

“本土化”，讲得通俗一点，就是希望那些研究自己社会和文化的学者能在研究上换一种角度，即一种非西方的视角。长期以来，人文、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角度是西方人设定的。当然，他们的这种设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与锤炼，才得以逐步确立、传播、扩散并获得其学术统治地位的。中国学者在近百年的学术研究中为此经受了从国学向西学的转化。不得不加以肯定的是，这种转化在相当程度上给中国学术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特征，因为在中国学术的自身成长中既没有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也没有哲学、伦理学、文学上的分类，仅仅是通过经、史、子、集之类来思考和探究人和社会。因此，如果说中国学者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接受了西方学术，那他们接受的不仅是西方的这些学科分类，同时还有西方人文、社会及行为科学中的视角，以及由这一视角确立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或者说，整个西方学科的研究范式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指南。在这一单方面的吸取过程中，我们的研究视角理所当然地被西方人规定下来，我们的研究理路和方法被他们训练成一种程式，而熟练地运用这些程式就意味着我们获得了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资格证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程式化研究中，学者们理解和解释出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历史和人的心理与行为，并不是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说服力，而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符合事实。社会，在众多的研究报告中变成了一个没有自己历史和文化的社会；人，在许多调查和实验中变成了没有社会背景和情境下的人。人文、社会及行为科学的本土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的。所谓本土化不是要回到中国过去的学术分类中去认识社会，而是要在

现有的学科中找到另一种视角，即一种本土的视角来研究人和社会。因为在这种视角中，我们既能看到我们的历史演变和文化理念如何造就了我们的社会，又看到我们的社会背景和特定情境如何模塑了我们的心理和行为；同样在这种视角中，我们还能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本篇中，我就以上这些问题来具体讨论一下本土化的方向、本土化的研究理路及研究方法等问题。

本土化研究的程度与限度：我们能走多远

人文、社会及行为科学本土化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气候，就已引来了各式各样的质疑和批评，诸如科学有无国界的问题、体与用的关系问题、方法论上的问题、传统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吸收与排斥的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中心与边陲的问题以及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等等。其中每一个问题都能成为争议的焦点，以至于本土化的研究还未完全展开就使这一提法本身变得相当复杂。本章在此不可能，也无力对上述问题做一一的讨论，只想就一些基本争议点做些探讨。

一、本土化的消长及其问题的症结

类似于本土化的提法（过去叫“中国化”）在我国 20 世纪 20—40 年代曾经出现过。当时的一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如潘菽^①、吴文藻、费孝通等不但发表过专文探讨过这一问题，而且还进行过一些实证研究，在当时的海内外学术界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②但由于当时中国处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学术

① 详见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刍议》，见《潘菽心理学文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7—52 页。

② 详见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见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8—244 页。

环境中，结果这一努力半途而废了。40年后，又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学术环境等因素的改变，这一口号再一次出现时，率先出现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并得到了当地相当一批学者的响应。现如今，从本土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人已在台港地区成为一种学术自觉与学术运动。他们定期召开研讨会及各种小型座谈会，创办专门研究刊物，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①80年代中期，这一思潮开始影响大陆学界，也可谓和有些大陆学者的想法一拍即合。本土化首先是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热烈的讨论，^②后又向其他学科延伸。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它一方面被学术规范化的呼声所淹没，^③另一方面又被全球化口号所笼罩。^④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大陆学界由本土化而形成的这种学术态势在台港不太可能出现，他们既不可能在学术上讨论如何规范化问题（因为没有受过学术规范化训练的人，根本就成不了学者）；也不可能在开展本土化的同时，提出什么全球化的问题（因为全球化是学者对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估计，它同学术研究上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大陆学者热衷讨论所谓“规范化”，说到底就是讨论我们所做的“学问”是不是学问，它们符不符合学术的形式和内容上的要求。学者们花如此大的精力来讨论这个问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陆学者总体学术水平同台港的差距，另一方面似乎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本土化，可能本土化没什么长进，反而同国际学术沟通却没有了。但

① 参见杨国枢、李亦园、文崇一等编著：《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5年版。杨国枢主编：《本土心理学研究》（丛刊），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创刊。

② 详见李庆善主编：《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论集·1992》，香港：香港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

③ 详见《本土化与规范化讨论》，见《中国书评》，1995年，1月（总第3期），1995年，3月（总第4期）。

④ 参见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无论如何，就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本身而言或就本土化的发起而言，本土化同规范化实无必然的联系，因为台港学者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压根就没想到大陆在学术规范上会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而大陆学者喜欢把本土化同全球化对应，细究一下，也没有什么理据。所谓全球化主要是就世界各国的政治、市场、通信和经济发展的趋势而言的，而本土化是就学术研究视角与研究策略而言的，根本不在一个讨论的范畴中。但这里有一种似乎能够说得通的观点是，既然世界各国的政治、消费、通信和经济都全球化了，自然学术研究也就没有必要本土化了。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述这种观点是以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将走向趋同性和单面性这一假设为前提的，而其中一个潜在的相关假设是，全球化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西方学术将始终占领国际学术舞台，因此我们不跟着走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个人作为本土化研究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我首先对这个前提持有疑问。我不在这里阐述我的观点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比我要高明得多，他们这几年来关于“文明的冲突”“单面人”及“后现代”“后殖民”的讨论，已足够让我们看到未来社会发展并不那么单一和趋同。即使我的这个疑问本身也值得怀疑，那么通过本土化研究来探讨一下这种趋同的可能性有多大，或速度有多快也是可以的。

追溯世界各地学者为何会倡导本土化的原因有相当的难度，其中既同部分西方学者因研究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困惑而产生的反动有关，又同一些非西方学者在追随和依附西方学术过程中进行的自我反思有关。虽说这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但本土化毕竟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单从非西方社会（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提倡者的心态上看，有两种因素在本土化运动的形成和促进中显得十分重要：一是在情感上。深受西方学术训练或影响的学者越来越不满于西方学术研究上的霸权主义，越来越